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孙子学史研究专题

“不战而屈人之兵”方法论在现代战争中的四重维度

周嘉成

(喀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喀什 844000)

摘 要:“不战而屈人之兵”绝非对战争能力的消解,而是以军事能力为根基,通过战略认知、国际规则与联盟结构的综合塑造,在较低烈度和较小代价下实现战略目的的全胜方法论。进入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的现代战争阶段,战争的边界已被彻底打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力交锋,而是呈现出经济封锁、科技垄断、舆论攻防、外交孤立的复合形态。现代战争的主战场正从硝烟弥漫的物理空间,转向“没有硝烟的综合博弈场”,经济、科技、舆论、外交等非军事领域已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核心维度。

关键词:《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经济;科技;舆论;外交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6.03.0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孙子兵法》是一部著名兵书,但其第一句话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不战。”^[1]战争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必须慎重对待,其“慎战、不战”与“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脉相承,即通过谋略、外交和综合实力化解冲突,以最小代价达成目标,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和平、以智谋取胜的智慧。

陈歌从战争观、作战方略、战争指导规律、军事指挥艺术、作战形式五个维度系统阐释了“善”在孙子思想体系中的内涵^[2]。吕锡琛等认为,“慎战”的核心是遏制战争,通过强大实力与战略智慧实现“不战而胜”^[3]。黄朴民认为,研究《孙子兵法》应“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缘法而生法”,根据时代条件灵活运用,这才是最上乘的境界^[4]。杨福林认为,孙武的战略威慑思想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境界,其实现需要三个

前提条件(备战、知战、慎战)、两大主要手段(伐谋、伐交),并追求“全”与“善”的目标^[5]。美国学者温迪·弗里曼在《孙子的思想与国际技术竞争》中指出,孙子所阐述的全胜之计,重点避免冲突和杀伐,兵不血刃而取胜^[6]。由此可见,学术界已从概念辨析、历史模式、现代应用、方法论反思、战略威慑等多个维度,对“不战而屈人之兵”形成了较为立体、辩证的研究成果,既揭示了其作为理想战略境界的价值,也指出了其实践中的局限性与前提条件。

进入 21 世纪,战争形态经历了从“物理域”向“认知域”、“数据域”与“金融域”的深层延展,但面对时代变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第一,多数研究聚焦于宏观层面的战争伦理与抽象威慑,缺乏针对经济、科技、舆论、外交等特定现代战场中“实操逻辑”的微观演练。第二,面对现代战争中高度隐蔽的“非战争行动”与

收稿日期:2026-01-14

基金项目:喀什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KD2026KY027)

作者简介:周嘉成(2001—),男,江西抚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mail:3357477661@qq.com

混合对抗,孙子思想在复杂博弈环境下缺乏针对性、系统性研究,未能有效对接现代国际博弈中“芯片战争”、“认知攻防”等高频、高压的真实场景。因此,如何从“善”与“全”的传统哲学高度,下沉到现代国家竞争的具体战术逻辑中,将“不战”之智转化为可操作、可量化的战略预案,成为当前兵学研究亟待突破的关键点。基于此,本研究旨在立足全球博弈新常态,系统挖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现代应用逻辑,重点探讨其在经济、科技、舆论与外交四大战场中的博弈机理与实现路径,为提升现代国家战略运筹能力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范式。

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核心内涵

作为《孙子兵法》全胜战略的精髓,“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突破了武力制胜的局限,以“全”为核心价值,遵循“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的层级路径展开,暗藏了“不战以能战为基、屈人以攻心为要”的辩证智慧。

(一)价值内核:以“全”为上的战略追求

《孙子兵法·谋攻篇》开篇即确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核心地位:“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7]17}其本质是对“全”的极致追求,既追求己方利益的完整保全,也强调对敌方利益的最小损害。孙子否定了“百战百胜”的传统认知,认为武力征服必伴随伤亡与动荡,而通过非对抗性手段达成政治目的,才是最高层次的战略智慧。

(二)实现路径:“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的层级策略

孙武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构建了清晰的战略实施路径,强调“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7]18}的四层策略组合,核心是“以非战争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后盾”。第一,“上兵伐谋”是最高战略境界,核心在于挫败敌方战略意图,通过展示优势与预判布局,从根源上消弭冲突。第二,“其次伐交”,即通过外交手段(斡旋、结盟)瓦解敌方联盟,孤立对手使其丧失行动能力。第三,“其次伐兵”,并非直接开战,而是以

军事威慑(如演习)传递“对抗必败”的信号,以制止战。第四,“其下攻城”,代价最大、效率最低的最终选择,意在警示决策者优先采用非武力手段。这警示决策者,唯有将非武力手段置于优先,方能体现古代中国的战略智慧。

(三)辩证边界:“不战”非“无战”,“屈人”非“灭人”

深入解读“不战而屈人之兵”,须理顺两个关键辩证关系。第一,“不战”绝非放弃武力,而是一种以坚实国力为后盾的主动战略抉择。孙子的底层逻辑是“以备止战”——“不战”的先决条件是以“能战”形成威慑。《九变篇》明确指出:“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7]64}这深刻表明,若缺乏军事、经济与科技等综合实力的硬支撑,“伐谋”与“伐交”便会流于空谈,“不战”亦将异化为消极畏战。第二,“屈人”的重心在于重塑并瓦解对手的对抗意志,而非消灭其物理存在。其精髓在于以最小代价达成战略政治目的,追求利益层面的共赢,而非“以强凌弱”的霸权扩张。这与西方战略思想中追求“绝对控制”的武力制胜逻辑形成了鲜明对比,更深刻地体现了东方智慧中目标与手段的动态平衡,以及战略思维的长期性与可持续性。

二、“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现代战争中的四大应用维度

《孙子兵法·谋攻篇》讲:“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现代语境下,这一古老智慧转化为通过综合国力迫使对手放弃对抗意图,以下从经济、科技、舆论、外交四个维度进行系统阐述。

(一)经济战:“以利为器”的现代转化与战略博弈

从“兵者诡道”向“利益博弈”的理论转化,深刻揭示了现代经济战的底层逻辑。《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深植于对“利”的精准计算与运用。“兵者,诡道也”^{[7]5}揭示了战略的能动性与艺术性,而“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等原则则为核心策略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其根本逻辑在于“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7]100}。现代经济战完美地继承了这一逻辑内核,其本质是一场围绕“利益”展开的博弈。它不

再以摧毁敌方肉体或占领领土为首要目标,而是通过系统性的经济利益诱导与战略性剥夺,精准塑造对己方有利的战略态势,使目标国清醒地认识到持续对抗所带来的经济代价将远超其可能获得的收益,从而从根本上动摇其对抗意志,迫使其回归理性谈判或直接放弃原有对抗政策,实现“不战而屈”的战略效果。

为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标,现代经济战已构建起一套复杂而精密的多维手段体系。第一,贸易制裁与精准反制是最直接且最常用的经济威慑手段。通过单边或多边方式,对目标国加征惩罚性关税、设置非关税壁垒、实施关键领域进出口禁令等,旨在打击其经济支柱产业,扰乱其国民经济正常运行。例如,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试图通过高额关税削弱“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延缓中国产业升级步伐。然而,中国采取精准反制,对美国各行业造成显著冲击,充分揭示了贸易战的“双输”本质,最终促使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进行磋商。

第二,金融博弈与体系压制。“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8],其手段超越了一般性的经济制裁。具体措施包括操纵汇率以干扰目标国市场、实施资本管制以阻止资本流动、冻结目标国官方与实体海外资产,乃至将其排除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等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之外。例如,乌克兰危机升级后金融制裁与反制裁成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较量的重要战场。参与对俄制裁的各方协同紧密,以推动俄罗斯债务违约、卢布贬值和形成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为主要策略。俄罗斯反制裁的主要策略包括:规制与激励并重以快速稳定国内股票及资本市场;推动卢布锚定天然气和黄金等硬通货以稳定汇率市场;强化俄罗斯与西方资本的利益联结以推高制裁成本;借助伙伴关系规避金融壁垒以拓展国际贸易;推动经济体系“去美元化”以降低整体风险。^[9]同时,俄罗斯积极推动与中国、印度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有效缓解了西方国家的制裁。

第三,对能源与关键资源的控制,赋予了主导国极其强大的战略杠杆。能源与战略性矿产资源是工业社会的基石,谁掌握了其供给链,谁就握有强大的战略杠杆。通过控制能源出口通道、影响国际资源定价权或对关键矿产资源实施

出口管制,可以对依赖进口的国家形成强大的威慑力。俄罗斯凭借其庞大的天然气储量与对欧管道网络,长期以来将能源作为对欧外交的重要工具。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通过调整天然气供应量与价格,显著增加了欧洲国家的能源成本与社会压力,成为其制约欧洲对乌援助的重要手段。

第四,切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行径,意在目标国的长期发展能力造成致命打击。在全球分工深化的今天,切断一国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系,能对其长期发展能力造成致命打击。主导国通过构建排他性的区域性经贸协定、推动产业链“回流”,或在关键核心技术环节实施“断供”,力图将目标国隔离于先进产业体系之外。美国近年来极力推动半导体等关键产业“去中国化”,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政策,限制高端芯片制造设备及技术对华出口,试图通过供应链脱钩来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维护自身技术霸权。

从中美贸易战的案例分析其中的“不战”逻辑与反制智慧。“不战”的含义是沟通交流,是“谈”。“反制”是在“谈”的同时,面对对方施压而不得不采取的辅助手段,最终目的是“以打促谈”。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10]230}2018年,美国国内经济增速为2.9%,如果分季度看,2018全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为2.2%、4.2%、3.4%和2.2%,在经济增速超过3%的时候,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更有底气,分别在7月、8月和9月三次对华加征关税。^[11]2020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从中美贸易战的进程也可以看出,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美国对华固然有打压和防范增强的一面,但是中国应对美国施压的能力和手段也在相应增加。中国并不是单纯被动挨打的一方,可以通过“打”和“谈”相结合的策略对美施展影响,形成压力,迫使其调整对华政策。^[11]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守“互利共赢”的底线,避免因情绪化反应导致冲突螺旋式升级,这体现了对“不战”这一最高境界的价值追求;中方并未被动承受压力,而是采取了对等策略,进行精准反制。最终,贸易战并未如美方所愿摧垮中国经济,反

而暴露了其自身的软肋,双方经过多轮博弈达成阶段性协议,冲突未进一步恶化。

(二)科技战:“伐谋”思想的技术赋能与制高点争夺

在现代国家间的战略竞争中,科技创新能力的深层博弈构成了《孙子兵法》中“上兵伐谋”理念的核心体现。“伐谋”的精髓在于从根源上瓦解对手的战略图谋,摧毁其对抗根基,从而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终极目标。当前,科技实力不仅决定着军事装备的代际差距与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能,更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基石。围绕“掌控核心技术、主导创新生态”的总体目标,现代科技战已将古典的“伐谋”智慧转化为对前沿科技制高点的激烈争夺。

这种战略博弈在实践中构建起了多维度的攻防体系,集中表现为四大核心手段。第一,通过核心技术封锁与出口管制实施直接压制。大国依托实体清单与管制法规,严格限制高端芯片、精密仪器及核心工业软件流向目标国,意图将其锁死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第二,争夺技术标准与规则的主导权。掌握标准即掌控行业话语权与利润分配,中国企业在5G标准制定中的突围便是打破西方垄断、拓展战略空间的典型案例。第三,科技人才流动管控与争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12][517]}科技强国在吸纳全球顶尖智力的同时,也常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目标国学者接触敏感技术,通过双向管控削弱对手潜力。第四,掀起前沿领域的“军备竞赛”。各国纷纷斥巨资投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及太空探索等未来赛道,力图构建非对称战略威慑,达成技术慑止的效果。

美国对华为的芯片禁令,是现代科技“伐谋”策略的经典案例。美方战略意图清晰,妄想通过精准打击中国科技崛起的标杆企业,迟滞甚至中断中国在5G和高端半导体领域的发展进程,维护其全球科技霸权。华为为摆脱“卡脖子”困境,确立了“掌握根技术”的生存逻辑,从源头重构技术版图,在芯片领域从追逐工艺转向架构创新,通过自研CPU/GPU/NPU等架构,以系统优化弥补制程限制;在操作系统领域放弃第三方定制,自研鸿蒙与欧拉实现端一边一云全覆盖;同时补齐数据库、编译器等基础软件短板^[13]。从

《孙子兵法》战略哲学审视,美国违背“合于利而动”的基本原则,陷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双输局面,同时低估了中国“先为不可胜”的战略决心与应对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14]面对技术打压,中国果断将科技自立自强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依托制度优势持续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在极限博弈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战略韧性与应对能力。

(三)舆论战:“攻心为上”的媒介化实践与认知域争夺

《孙子兵法》中的“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7][58]}深刻揭示了心理对抗在战争中的核心地位,将“攻心”视为战略艺术的最高境界。在信息时代,现代舆论战正是这一古典思想的延伸与升华,其作战域已从传统的物理战场全面拓展至全球媒介空间与人类认知领域,本质上是一场围绕人心向背、公众认知与国际认同的激烈争夺。通过系统性地构建并传播有利于己方的叙事,同时解构、批驳和压制对手的叙事,交战方能够在未动武力的前提下削弱敌方意志、分化其联盟并塑造有利的国际舆情,从而为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创造必要的认知条件。

围绕上述“攻心”战略,现代舆论战在实践中演化出日益多元且隐蔽的多维手段。第一,在叙事构建与框架竞争方面,各方均致力于打造能够自我论证且吸引共鸣的逻辑闭环(如俄乌冲突中“应对北约东扩威胁”与“反侵略”的框架对立),依托官方与社交媒体在全球争夺事件的解释权。第二,在信息操纵与认知干扰上,通过选择性报道、裁剪事实甚至制造虚假信息,并结合算法推荐放大特定声量,以此制造信息迷雾、扰乱敌方社会心理。第三,将价值观输出与文化渗透作为长期的“攻心”策略,依托影视、游戏等文化产品潜移默化地输出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培养“亲己”力量。第四,在舆论压制与平台反制上,各国纷纷采取硬性措施,如限制敌方媒体传播、封禁官方账号、扶持本土替代平台,并组织力量对敌方言论进行系统性批驳。

俄乌冲突作为一场全媒介参与的全球性舆

论战,为认知域争夺提供了多维攻防的典型案列。在乌克兰危机下,美西方实际是以乌国土为“棋盘”、乌民众和乌现政府为“棋子”,针对俄方打一场“代理人战争”。同时,为占据舆论制高点,将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定义为侵略,指责其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破坏欧洲及世界和平。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他俄领导人进行“污名化”和“妖魔化”宣传。指责俄罗斯军队直接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甚至“种族灭绝”。面对美西方舆论攻势,俄罗斯迅速采取反制措施。第一,将美西方国家的一些反俄媒体逐出俄罗斯,关闭“德国之声”莫斯科分社,要求脸书网站对不符合俄罗斯利益的一些帖子进行地域封锁或隐藏,等等。第二,极力谴责美西方国家是乌克兰危机第一责任人,同时谴责乌当局推动乌克兰危机升级。第三,宣传乌克兰危机揭开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序幕,把危机的责任归于美西方国家。第四,宣传俄是受欺侮一方、是为生存而战,号召俄罗斯人民为国而战。^[15]这一博弈过程深刻表明,现代舆论战中单纯依靠宣传技巧与平台优势已无法确保“攻心”全胜,叙事的真实性、道义的正当性以及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契合度,才是赢得人心并实现“不战而胜”的深层关键。

(四)外交战:“伐交”思想的全球化拓展与联盟博弈

《孙子兵法》将“伐交”列为仅次于“伐谋”的战略选择,其核心要义在于通过纵横捭阖的外交斡旋瓦解敌方同盟、巩固己方友邦,从而在战略态势上孤立对手,使其陷入“不敢战”或“战则必孤”的绝境。在现代国际政治体系中,外交战正是这一古典战略思想最直接的现实映射。作为和平时期与危机状态下的一场无声较量,现代外交战聚焦于国际影响力、规则制定权与盟友凝聚力的深层博弈。其终极目标是通过构建于我有利、于敌不利的国际格局与力量对比,迫使对手在孤立无援中重新评估战略选择,最终放弃对抗并接受或默认既定安排。

现代外交战在实践中演化出一套多元化的

战略工具包,主要集中于四大维度的角逐。第一,联盟体系的构建、巩固与扩张是“伐交”最传统且核心的环节。例如,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及“四方安全对话”(QUAD)^①等机制,均旨在编织针对特定对手的战略威慑网。第二,在国际规则与机制的主导权争夺中,各国依托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平台激烈交锋,以期抢占道义与法理制高点;中国亦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②等举措,积极塑造新规则并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第三,通过外交斡旋与冲突调停主动介入地区热点,不仅能有效消除周边安全风险,更是以智慧化解争端、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直接体现。第四,综合运用降低外交级别、驱逐外交官及推动国际组织中止资格等手段实施外交孤立与制裁施压,配合经济手段形成“组合拳”,从而大幅拉升对手的国际生存成本。

在现代外交战的宏阔实践中,中国斡旋沙伊和解堪称运用“伐交”思想化解冲突的经典范例。在中方积极斡旋下,沙特阿拉伯王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于2023年3月10日在北京达成协议,并于4月6日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宣布恢复外交关系,沙伊两国关系迈向共识、合作、和平的新时代。^[16]这一历史性突破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智慧。首先,其切入点精准契合了“合于利而动”的原则,直指中东教派与地缘矛盾的核心,既顺应了地区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渴望,又满足了中国维护周边稳定的战略需求。其次,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与公正中立的立场,依托良好的外交信誉与“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济合作潜力,为化解双方历史积怨提供了可靠环境与强劲推力。最后,沙伊和解不仅直接降低了军事冲突风险并掀起中东“和解潮”,更极大提升了中国作为负责任调解者的国际形象,有效削弱了域外势力分而治之的操控力。这雄辩地证明,秉持“和合共生”、“互利共赢”理念的建设性斡旋,远比传统的“零和博弈”与“阵营对抗”更能有效实现战略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在新时

① 由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组成的非正式战略论坛,QUAD不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军事联盟,是一个更为灵活、松散的“小多边”合作平台。

② AIIB是由中国倡议并作为最大股东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是一个专注于实体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银行”。

代的辉煌胜利。

三、“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现代战争应用中的现实挑战

尽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方法论在现代战争的经济、科技、舆论、外交四大维度中展现出了强大的适配性与实践价值,但在多极化格局深化、技术迭代加速、国际规则重构的宏观背景下,其具体应用仍面临诸多现实梗阻。这些挑战既源于战略实施的外部环境制约,也深刻涉及内在策略运用的逻辑困境,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一) 实力制衡下的威慑失效风险加剧

《孙子兵法》言:“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7]26},这深刻强调了自身实力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核心前提在于“能战”,即凭借绝对或相对的实力优势形成有效威慑。然而,在现代多极化格局下,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呈现出高度非对称与动态化的特征,传统单一维度的威慑手段已难以达成预期效果。

一是大国之间逐渐形成相互制衡的态势,任何极限施压举措都极易引发对等反制,从而陷入威慑与反威慑的恶性循环。比如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政府宣布,自2019年5月10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美国试图通过关税制裁遏制中国产业升级。中国实施精准反制,对所列2493个税目商品,实施加征25%的关税;对所列1078个税目商品,实施加征20%的关税;对所列974个税目商品,实施加征10%的关税;对所列595个税目商品,实施加征5%的关税。^[17]这些所列税目商品涵盖农业、工业、制造业等领域,有效遏制了美国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维护了国家经济利益与全球贸易秩序。

二是部分小国依托关键资源禀赋或地理区位优势,与其他大国形成利益共同体,以维护自身权益。例如,越南一度通过加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以牵制中国。在第十八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越南与美国在“印太战略”相关政策方面达成共识。另外,对于蓬佩奥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罔顾事实的攻击,得到了越南的积极回应,声称“东南亚国家希望美国在维护南中国海和平中发挥

作用”。^[18]同时越南通过联合中国来抵御美国。“尽管近年来中越因南海争端、贸易逆差等问题关系有所波动,但中国始终是越南国家和执政党的坚实后盾。”^[19]2026年习近平总书记与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在会谈中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越南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愿同越方秉持初心、赓续友谊,团结协作、相互支持。”^[20]越南通过维持与中国双边关系的稳定,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力求将战略风险降到最低。

(二) 技术迭代与规则约束压缩战略实施空间

在现代科技战与经济战的博弈场中,技术迭代的加速性与国际规则的约束力正在显著压缩“不战而胜”策略的实施空间。

一是技术封锁的“倒逼效应”削弱了科技威慑的长期性。对核心技术的严密封锁往往会激发被制裁方的自主创新动能,进而缩短其技术突破周期。美国对中国芯片产业的打压,反而促使中国加大研发投入,在中低端芯片领域迅速实现自给自足,逐步降低对外部技术的依赖,致使美国的技术威慑边际效应不断递减。此外,国际技术标准制定权已不再为少数大国所垄断,新兴经济体在5G通信、新能源等前沿领域的话语权稳步提升,传统依靠标准垄断实施威慑的路径已难以为继。

二是国际法规范与国际道义强化了战略实施的合法性危机。现代国际社会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容忍度持续走低,单边制裁或封锁若突破国际法底线,必将招致广泛谴责与抵制。例如,在巴以冲突中,美国无条件援助以色列,向以提供约17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巴建国等事项单方面反对;欧洲并不以以色列作为战略支点,更不愿卷入地区冲突,反而是加沙人道援助的最大出资方。在停火问题上,美欧虽都支持停火,但美国倾向于所谓“人道主义暂时停火”,欧洲主要国家则认定以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21]。这种跨大西洋的立场分歧与道义落差极大削弱了美方战略威慑的实际效能。

(三) 信息化时代舆论战的攻心困境凸显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现代舆论战本质上是古典“夺气夺心”思想在媒介化时代的

深度实践。然而,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架构以及信息传播的即时性、碎片化特征,致使当前的“舆论攻心”陷入双重困境。

一是虚假信息的信誉反噬风险。部分战略主体为追求速效的舆论压制,刻意炮制并散播虚假信息。尽管短期内可能混淆视听,但在信息高度透明的数字化时代,这类操作极易被交叉验证所戳穿。一旦谎言破产,不仅会导致自身丧失舆论话语权,更会严重透支国家信誉。在俄乌冲突的认知博弈中,双方均曾被曝光传播失实的战场信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信任危机,直接解构了舆论战原有的“攻心”效果。

二是排他性叙事难以唤起跨文化共鸣。现代舆论战的核心在于抢占道义制高点,但部分行为体在构建叙事时过度聚焦本国狭隘利益,漠视和平、发展、公平等全人类共同价值诉求,因而难以在跨文化语境中引发情感共鸣。更为严峻的是,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垄断全球主流媒体及核心社交平台,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难以有效触达国际受众。这种结构性不对等造成的信息壁垒与认知隔阂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范围内“攻心”的难度。

(四)多极化格局下伐交策略实施难度陡增

“伐交”思想的核心逻辑在于瓦解敌方联盟并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支持。但在当今国际社会,主权国家间利益交织与深度融合的复杂程度远超传统时代,“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联盟思维已不再适用,这导致现代“伐交”的实施面临重重阻碍。

一是多边机制的碎片化削弱了外交合力。随着联合国、世贸组织等全球性多边框架的权威性频受冲击,以及欧盟、东盟等区域性组织战略自主意识的觉醒,各国在国际多边博弈中更加趋于务实,将本国利益最大化置于首位。这种利益诉求的多样化,使得任何一方都难以轻易拼凑出统一且稳固的外交施压阵营。

二是全球利益共同体的韧性提升了联盟瓦解门槛。在全球化浪潮下,国家之间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产业链供应链网络。即便是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国家,也往往在能源保障、粮食安全等关键领域存在无法割裂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此背景下,针对特定国家实施极端

的外交孤立或经济制裁,极易产生外溢效应并损害第三方甚至全球利益。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对俄罗斯石油行业实施了极为严厉的制裁,俄罗斯作为五常大国,拥有丰富的手段进行反制,如通过贸易转移将重心转向南方国家市场、采取可规避禁令的贸易手段,西方的单边制裁行为得不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认可,无法形成有效的封锁^[22],未能达成全面孤立的战略初衷。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深刻重塑了国际力量对比,传统霸权国主导的“单向伐交”模式愈发难以奏效,多元主体的深度参与使得未来的国际博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四、“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现代战争中的优化路径

面对世界多极化加速深化、前沿技术跨越式迭代以及国际规则体系深刻重构的现实梗阻,“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古典战略的现代应用,绝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的零和博弈与单维威慑层面。在错综复杂的现代大国博弈中,必须立足全局性的系统思维,跳出历史局限,从统筹复合威慑模式、突破科技与法理约束、重构舆论包容叙事,以及深化多边伐交合作四个核心维度,进行全面的战略升级与路径优化。

(一)统筹复合实力与弹性威慑,破解实力制衡的博弈困境

面对大国对等反制与小国多方逢源交织导致的威慑失效风险,破局的关键在于跳出传统的对抗框架,统筹复合实力与弹性威慑,以此全面破解实力制衡的博弈困境。

第一,由“单维极限施压”转向“全维非对称威慑”。在与大国的博弈中,单一的军事恫吓或经济制裁极易陷入“威慑—反制”的消耗性死循环。为此,必须深度整合经济、金融、网络及太空等新型战略资源,构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非对称制衡体系。通过跨维度的精准施压与降维打击,使对手的传统反制手段失去着力点,进而重塑战略威慑的有效性与主动权。

第二,构建动态平衡的“相互依存性威慑”机制。针对部分国家“避险”与大国平衡的战略诉求,应摒弃强迫选边站队的排他性阵营思维。通过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结构性绑定,将刚性的

“强制性威慑”转化为柔性的“利益性牵引”。以打造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为抓手,使对方因忌惮沉没成本与自身核心利益受损而主动放弃对抗,最终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境界。

(二)坚持自主创新与规则引领,突破技术与法理双重约束

应对技术迭代与规则限制带来的战略空间压缩,破局关键在于坚持自主创新与规则引领,从而有效突破技术与法理的双重约束。

第一,变“技术封锁”为“标准引领”与核心技术攻坚。面对技术封锁边际效益日益递减的现实,战略重心必须从阻遏对手转移至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在5G、人工智能及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应积极参与并主导国际标准制定。通过核心技术突破与标准全球布局,以“标准规则权”取代“技术垄断权”,进而在更高维度确立持久的科技威慑力。

第二,锚定国际法理底线,重塑战略行动的道义合法性。战略举措必须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及现代国际法原则深度嵌合,避免重蹈单边霸权遭反噬的覆辙。在行使制裁或反制时,需精准把握正当维权与过度施压的界限。通过占据法理高地,广泛争取国际社会的共鸣与支持,将“强权即真理”的霸权思维扭转为“得道多助”的战略优势。

(三)坚守信誉建设与价值包容,重构舆论战“攻心”质效

面对信息化时代虚假信息反噬与排他性叙事难以引发共鸣的攻心困境,破局的关键在于坚守信誉建设与价值包容,从而从根本上重构舆论战的“攻心”质效。

第一,摒弃信息投机,确立以“国家信誉”为核心的传播机制。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信息交叉验证极为便捷的当下,任何炮制虚假信息的短期投机行为都极易遭受反噬。因此,必须坚决摒弃舆论博弈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建立公开、透明、真实的权威信息发布体系。要将国家公信力视为最宝贵、最核心的舆论战资产,坚持以“真”破“伪”、以事实立言。依靠长期积淀的真实性与权威性抢占国际舆论第一阵地,从而对受众产生持久且深刻的心理震慑与战略说服。

第二,跨越结构性壁垒,构建契合全人类共

同价值的包容性叙事。面对复杂的国际话语交锋,必须跳出西方主导的、基于狭隘本国利益的排他性叙事逻辑,转而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底层的叙事基座。在传播实践中,应精准对接广大发展中国家及不同文化语境受众的真实心理诉求,寻找跨文化交际的“最大公约数”并激发情感共鸣,以此从根本上瓦解敌对势力刻意制造的认知壁垒,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引领与思想“夺心”。

(四)织密利益网络与深化多极合作,升级现代“伐交”战略

面对多极化格局下多边机制碎片化与利益共同体难以割裂的挑战,破局的关键在于织密利益网络并深化多极合作,从而全面升级现代“伐交”战略,破解复杂博弈的实施困境。

第一,超越“非友即敌”思维,以全球利益网络瓦解遏制阵营。在高度相互依存的现代国际关系中,联盟瓦解门槛极高,传统谋求绝对孤立的政策已难以奏效。因此,必须摒弃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顺应全球化产业链“你中有我”的时代特征。应主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将本国核心利益与经济引擎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之中。通过构建纵横交错的利益羁绊,使任何发起围堵的意图都面临不可承受的自损与反噬代价,最终以不可割裂的利益绑定实现“以利破交”的战略目标。

第二,依托并重塑多边机制,汇聚广泛的大外交合力。针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多边机制日益碎片化的现状,应主动担当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修复者。深度融入并强化与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的战略协同;同时,通过积极提供“一带一路”倡议等高质量的全球公共产品,广泛团结“全球南方”及广大中间地带国家。以此凝聚国际社会最大共识,形成对霸权主义“单向伐交”的系统性对冲与全面反包围,开创大外交的新格局。

综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当代国际博弈中,已实现从传统军事谋略到综合国力博弈的范式转型,成为融合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现代全胜战略。这一理念绝非消极避战,而是立足“能战方能止战”的逻辑作出的主动战略抉择。当前博弈延伸至经济、科技、舆论、外交四大领域,依托利

益绑定、标准主导、正向叙事与多边斡旋,构建起非武力的综合威慑与制衡体系。面对大国实力制衡、技术封锁、舆论对抗等现实挑战,该战略必须与时俱进迭代升级,摒弃西方零和博弈与极限施压思维,运用全维非对称威慑、包容性价值叙事,依托深度利益网络打破阵营围堵。究其根

本,这一古老兵学智慧以“和合共生”为终极目标,坚持以最低成本化解矛盾、平衡各方利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度契合。在智能化、全球化持续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它既是传承千年的东方战略智慧,更是中国应对复杂国际竞争、牢牢把握博弈主动权的成熟方案。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J]. 求是, 2021(1): 4-13.
- [2]陈歌. 《孙子兵法》“善”概念的军事学意涵[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 2026, 43(1): 17-24.
- [3]吕锡琛, 曹静. 孙子“慎战”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 求索, 2010(12): 97-98.
- [4]黄朴民. 对深化《孙子兵法》研究的几点思考[J]. 滨州学院学报, 2022, 38(1): 5-12.
- [5]杨福林. 从《孙子兵法》看孙武的战略威慑思想[J]. 兰台世界, 2013(36): 18-19.
- [6]温迪·弗里曼. 孙子的思想与国际技术竞争[J]. 军事历史研究, 1990(4): 167-168.
- [7]孙武. 孙子兵法[M]. 郭化若,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8]党蓓蓓, 魏紫钰, 梁鹏, 等. 金融深化视角下金融支持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25(18): 20-23.
- [9]朱海华, 高思宇. 俄罗斯与西方国家间的金融制裁博弈: 策略、效果与启示[J]. 欧亚经济, 2024(1): 58-76.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 第 1 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 [11]宋国友. 中美贸易战: 动因、形式及影响因素[J]. 太平洋学报, 2019, 27(6): 64-72.
- [12]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13]守正出奇: 华为在技术封锁下的底层创新之路[EB/OL]. (2026-03-01)[2006-03-10]. <https://developer.huawei.com/consumer/cn/forum/topic/0201207777172836406?fid=23>.
- [14]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N]. 人民日报, 2025-10-29 (1).
- [15]林斯嫻. 乌克兰危机下美西方与俄罗斯的舆论战及其启示[J]. 国际问题研究, 2023(4): 120-134.
-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联合声明[N]. 人民日报, 2023-07-19(3).
- [17]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的公告[EB/OL]. (2019-05-13)[2026-01-10]. 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9-05/13/content_5391208.htm.
- [18]王传剑, 黄诗敬, 王居正. 印太战略下美越安全合作的进展、动因及影响[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2): 159-174.
- [19]倪春丽. 奥巴马时期美越关系研究[D]. 泉州: 华侨大学, 2018.
- [20]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举行会谈[N]. 人民日报, 2026-04-16(5).
- [21]刁大明. 新一轮中东乱局进一步瓦解跨大西洋关系[N]. 光明日报, 2026-04-05(5).
- [22]关毅, 黎迅, 林树昱, 等. 俄乌冲突下西方对俄罗斯石油行业最新制裁的结果及影响分析[J]. 中外能源, 2023, 28(8): 1-7.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he methodology of “subduing the enemy without fighting” in modern warfare

ZHOU Jiacheng

(School of Marxism, Kashi University, Kashi 844000, China)

Abstract: “Subduing the enemy without fighting” is by no means a negation of war-fighting capability. Instead, it is a methodology of comprehensive victory that, grounded in military strength, achieves

strategic objectives with lower intensity and at smaller cost through the integrated shaping of strategic cognition,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alliance structures.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warfare under informational and intelligent conditions, the boundaries of wars have been thoroughly broken down. Warfare is no longer confined to traditional military confrontations but manifests in a composite form encompassing economic blockades, technological monopolies, information warfare, public opinion campaigns and diplomatic isolation.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modern warfare is shifting from the smoke-filled physical domain to a “comprehensive arena of non-kinetic contest”, where non-military domains, such as economy, technology, public opinion and diplomacy, have become the core dimensions that determine the outcome of war.

Keywords: *The Art of War*; subduing the enemy without fighting; economy; technology; public opinion; diplomacy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周嘉成.“不战而屈人之兵”方法论在现代战争中的四重维度[J].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6,43(3):28-37.

Zhou Jiacheng.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he methodology of “subduing the enemy without fighting” in modern warfare[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2026, 43(3): 28-37.

本 刊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等在其各自的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及在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和稿酬(即包括印刷版、光盘版和网络版等各种使用方式的报酬)一并支付。如作者对本声明持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